

拉曼大學

中華研究院中文系

從《熱河日記》看朴趾源 “尊周思明”與“北學中國”之議

**The Discussion between “Recounting Ming” and “Northern School”
of Bak Jiwon in *Yeolha Ilgi***

科目編號： ULSZ 3094

學生姓名： 林芷薇

學位名稱： 文學士（榮譽）學位

指導老師： 余曆雄老師

呈交日期： 2018年8月10日

本論文為獲取文學士榮譽學位（中文）的部分條件

目次

題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謝-----	iv
第一章 緒言-----	1
第一節 選題意義與研究動機-----	2
第二節 前人研究概況-----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	5
第二章 “尊周思明”的淵源-----	7
第一節 慕華心態與朱子正統觀-----	8
第二節 從“文化上國”到“實力大國”-----	10
第三章 “北學中國”的內涵及其與“尊周思明”的關係-----	15
第一節 朴趾源“北學中國”的理論根據-----	17
第二節 利用厚生之對象-----	21
(一) 車馬-----	21
(二) 水利-----	22
(三) 生產工具-----	23
(四) 房屋-----	23
第四章 “他者中國”：朝鮮意識的體現-----	25
第一節 預設的朝鮮士人讀者-----	25

第二節 中國的論述，朝鮮的關懷-----	28
第五章 結語-----	32
參考文獻-----	33

從《熱河日記》看朴趾源
“尊周思明”與“北學中國”之議

The Discussion between “Recounting Ming” and “Northern School”
of Bak Jiwon in *Yeolha Ilgi*

宣誓

謹此宣誓：此論文由本人獨立完成，凡論文中引用資料或參考他人著作，無論是書面文字，電子資訊或口述材料，皆已於註釋中具體註明出處，並詳列相關的參考書目。

簽名：

學號：

日期：

摘要

公元 1644 年，明清鼎革，華夷變態。尊奉儒家文化的朝鮮難以接受此變故，而以境外之優勢，持續使用明朝紀年、著明衣冠、祭祀崇禎皇帝與明東征將士，並以“小中華”自居，開啟長達三百多年的“尊周思明”之旅。朝鮮在政治上臣服於清朝，繼續以事大關係往來中國，心態上卻甚鄙夷胡虜建立的政權。至 18 世紀，朝鮮實學興起，其中的北學派代表多有燕行中國經歷，開始意識到一直以來所鄙夷的清中國，原來實力比朝鮮強大。他們主張北學中國，卻與實踐已久的“尊周思明”思想文化產生衝突。作為北學派代表，朴趾源（1737-1805）於 1780 年燕行中國，著有《熱河日記》，裡面企圖調和“尊周思明”與“北學中國”的關係以回應彼時朝鮮的問題。本文梳理《熱河日記》裡的“尊周思明”與“北學中國”之議，發現朴趾源雖主張學習清中國，卻未涉及文化認同清中國。“尊周思明”與“北學中國”雖討論的是中國，然背後反映的卻是朝鮮的關懷，系朝鮮漫長的“尊周思明”思想文化裡某個階段的變化與體現。

關鍵字：朝鮮王朝 朴趾源 《熱河日記》 尊周思明 北學派 言說史

致謝

本文選題乃系裡陌生之領域，卻未獲導師阻攔，任己發揮，在經驗所及範圍給予指導，並引薦學生於韓國高麗大學崔溶澈教授與趙冬梅教授當面請教論文問題。故本文得以完成，實托老師雅交，在此致謝余曆雄老師及兩位高麗大學教授不吝賜教。

由於本文材料難覓於本校，故此致謝方美富老師、南京大學毛睿老師、王智霖同學與龐育康同學在搜羅材料方面給予一臂之力。

此外，亦感謝家人朋友於作業期間的關懷與照顧，學習路上不寂寞。

最後，感激自己無數次在夢魘的邊緣拯救自己。於人，我或太令人失望；於己，我已是自己的小英雄。

第壹章、緒言

明、清兩代，中、韓兩國以宗藩關係頻密往來，這種關係建立在以中國作為主體而向外的朝貢體制（Tributary System）¹上。終明一代，朝鮮無論冊封王室成員，抑或確定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針，都要遣使請示明朝。自朝鮮太祖始，幾乎每年都遣使中國，少則一年一次，多則一年三、四次。據徐東日不完全統計，明代的 227 年裡朝鮮使臣共出使中國 1252 次，平均每年 4.6 次。

（徐東日，2010：8）明清更替後，清朝沿襲明朝對朝鮮的事外關係。高麗、朝鮮使臣回國後將其在華見聞、體悟寫成官方報告或私人日記，故兩代以來朝鮮使臣訪華之密，造就了數量龐大、時間持長的漢文紀行文獻。元代李承休的行使日記稱為《賓王錄》（1273），明代大部分的行使記錄稱為《朝天錄》，至清代才廣泛使用《燕行錄》一稱。故林基中將朝鮮人於元、明、清三代到中國首都之紀錄，以《燕行錄》統稱之²。目前韓國共整理出 568 種“燕行錄”，體裁包括官方文書、日記、詩歌、雜錄、小說等。這批異域史料記載了許多中土資料未所聞見之事，彌補了中土史料之不足。

¹ 來自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1941 年提出的“朝貢體制輪”，（Fairbank, J.K. & Teng, S.Y. 1941:135）指歷史上以中國儒家禮治文化為中心向周邊擴展的一套世界秩序，涉及東亞諸國，可分為三個大圈。第一個是漢字圈，又幾個最鄰近而文化相同的屬國組成，如朝鮮、越南、琉球與某些短暫時期的日本；第二圈是內亞圈，由亞洲內陸遊牧民族或半遊牧民族等從屬部落或屬國構成，他們不僅在文化上異於中國，甚至威脅邊境；第三圈是由關山遠洋以外的“外夷”組成，如日本、東南亞及歐洲。（費正清編、杜繼東譯，2005：2）除了“朝貢體制”，亦有學者以“漢字文化圈”、“冊封體制”或“天朝禮治體系”稱呼中國歷史上的國際關係。

² 學界對《燕行錄》的稱呼仍有爭議，如徐東日稱這批文獻為“使華錄”（徐東日，2010：1）；張伯偉則提倡稱之為《中國行紀》（張伯偉，2016：8）。蓋從“朝天”到“燕行”涉及褒貶之分，以“使華錄”或“中國紀行”稱之則較為中性。除了名稱，這批文獻所涵蓋的時間範圍也有廣、狹之分，前者包括唐、宋、元時期高麗/朝鮮人在華的記錄，後者則主要指明清兩代朝鮮使臣的記錄。鑒於以上諸種爭議，本文將使用學界普遍的稱呼“燕行錄”稱之，使用引號而非書名號則用以指代廣義的朝鮮出使中國的紀行文獻，不獨指清代。

這批龐大的文獻中，朴趾源的《熱河日記》乃當中鉅作。朴趾源（1737—1805），字仲美，號燕巖，出身自十八世紀漢城世族名門。1780年（朝鮮正祖四年，乾隆四十五年）陰曆六月，朴趾源堂兄朴明源以正使身份率朝鮮使節團赴清祝賀乾隆七旬萬壽聖節，朴趾源以隨行員的身份一同赴往。是次賀壽慶典在熱河舉行，故朝鮮使節團至京后又發往熱河。由於朝鮮使節團一般的路程不經熱河，故朴趾源同年十月回國後，將其在華經歷整理成書，以《熱河日記》命名之。《熱河日記》有二十六卷，前一部分以日記體記錄在華行蹤；後一部分以專題闡發議論。該書記錄了中國的山川、天文、地理、文物、政治、宗教、醫學……然《熱河日記》挑動了朝鮮固有觀念，受朝鮮儒士鄙視，又朝鮮正祖斥之為“稗官雜記”、“文體卑下”，故朴趾源逝世後的百年間長期被禁止刊行，僅以鈔本形式在民間流傳。

一、選題意義與研究動機

《熱河日記》對中國的稱呼有兩種：“上國”與“大國”，分別指代“理想中國”與“現實中國”。這種分裂的中國論述，普遍存在於明亡後的朝鮮“燕行錄”中，與當時朝鮮的“尊周思明”文化有關。然比較朴趾源對“大國”的論述將發現其與一般“燕行錄”對明亡後“現實中國”的鄙夷態度有所不同，原因涉及興盛於十八世紀朝鮮的實學思想。作為一名北學派的實學家，朴趾源固然提倡學習清代中國；同時，他的另一個身份卻是奉皇明中華為正朔的朝鮮士人。本文主要著眼於《熱河日記》中對兩個中國的論述，從中梳理朴趾源如

何調和“尊周思明”與“北學中國”的關係，並企圖從他的調和中，窺視“尊周思明”與“北學中國”兩種思想的交鋒與論辯如何反映彼時朝鮮文化認同的問題。本文第一章主要交代朝鮮“尊周思明”的文化淵源與歷史淵源，並闡述“尊周思明”的思潮下，朝鮮對中國的論述如何分裂成“理想中國”與“現實中國”；第二章則交代北學派的興起背景及北學派先驅洪大容新華夷觀在朝鮮引起的爭議。在這背景下，通過《熱河日記》裡的論述與朴趾源主張的學習對象，探析朴趾源如何建立“北學中國”的理據及調和其與“尊明”的關係；第三章則以比較文學形象學理論及其他書寫的策略，看朴趾源如何展現“大國”的形象，及該形象如何反映朴趾源旅華背後的“利用厚生”關懷。通過“他者——自我”的關係，看出朴趾源的“尊周思明”與“北學中國”之議，雖討論對象乃中國，反映的卻是 18 世紀末朝鮮自身的問題。

二、前人研究概況

“燕行錄”的各種主題研究中，本文主題落在思想史脈絡下華夷觀念的相關討論中³。這脈絡主要討論中、朝交流中的思想史課題，包括“尊周思明”與華夷觀。由於朝鮮 18 世紀興起的北學派實學對朝鮮華夷觀及“尊周思明”的內容有所嬗變，尤其他們提倡北學中國，又其代表多有燕行經歷，故學界關注朝鮮對中國的接受與想象時往往便注意到這班實學家。當中，尤以洪大容與朴趾

³ 此項分類來自裴英姬《〈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其分類包括：政治史脈絡下朝貢關係相關討論、經濟史脈絡下朝貢貿易相關討論、思想史脈絡下華夷觀念相關討論、文化交流史脈絡下人物交流及文化傳播相關討論。

源最受關注。圍繞實學的研究主題包括其形成因素、代表學說、推動過程及其對朝鮮的影響，學者尤強調其進步意識及近世轉向。這些研究若千寬宇〈洪大容의實學思想〉（1958）、金龍德〈貞蕤朴齊家研究〉（1961）、閔斗基〈熱河日記의一研究〉（1963）、李佑成〈實學研究序說〉（1973）、劉奉學《燕巖一派北學思想研究》（1995）、葛榮晉《韓國實學思想史》（2002）等。

除了圍繞實學本身，目前學界多關注朝鮮的對華觀演變及北學派在當中起到的影響。陳尚勝《朝鮮王朝（1392-1910）對華觀的演變——〈朝天錄〉和〈燕行錄〉初探》（1999）將朝鮮對明、清的心態劃分作“事大論”——“華夷論”——“北學論”這幾個階段，初步從宏觀的時間縱向角度綜合朝鮮對華觀的演變。然裴英姬指該作涉及的史料未足，並未能掌握其主要變化。近年較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有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徐東日《朝鮮朝使臣眼中的中國形象——以〈燕行錄〉〈朝天錄〉為中心》（2010）、葛兆光《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2014）及吳政緯《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這些著作都從較長的時間段考察了朝鮮對中國的思想接受嬗變。孫氏以大量的中、英及朝鮮文獻，兼物質材料，探析朝鮮尊明的心態、文化根源及尊明的方式，揭示宗藩關係事誠的另一面；徐氏則整理了明末至 18 世紀朝鮮紀行文獻中對中國形象的論述，對象涉及人文地理，從中國形象的嬗變窺視朝鮮對華思想接受的變化。葛氏則從“他者——自我”的關係看朝鮮如何通過論述中國而建構自己的文化認同意識，並拋出 17 世紀後東亞有否認同的問題；上述三部都從中朝交往的當下看中朝的關係，吳氏則以“認同的研究史”

切入，關注中朝交往以外朝鮮士人間對中國的各種評價與言論，尤以曾燕行的士大夫為中心，探討 17、18 世紀的朝鮮士人如何面對中國。

這些碩果對本文的研究可謂助益甚多。

三、研究方法

傳統“觀念史意義下的思想史”視語言為思想或觀念的載體，觀念則是一種超語言的抽象存在。然“作為言說史的思想史”主張語言不僅具備言說功能（Locutionary），還包括“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及“以言施效”（Perlocutionary）的向度。“以言施效”指說話者透過某些話來做事，是超出文本外的；“以言行事”指說話者使用某些話來做事，等同作者的“意向”（Intention），是包含在文本裡的。（大衛·康納丁編、梁永安譯，2008：251）欲指認出一段作為“以言行事”的話語的意義，則必須知道它所處的言說情境或脈絡。本文主題的脈絡系東亞漢文化圈。

1960-1970 年代，西嶋發表的“東亞世界論”有以下內涵：一，以中國為中心包括周邊的朝鮮、日本、安南與西北迴廊地帶，以漢字、儒家、佛教、律令制為共同特點；二，除了文化傳播，東亞世界還賴中國與周邊的冊封等政治關係維持；三，其形成於魏晉南北朝，隋、唐交流緊密，宋代趨於崩潰，明代重新復活。（岸本美緒，2005：82）針對以上內涵，學者相繼做了批判與商榷，如正視中國周邊以外的觀點，若費正清提出的“中國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 便涵蓋北亞、中亞的遊牧與狩獵民族。王汎森亦指出，若能保持“東亞交涉”這一理論自覺，便能注意到原先以中國為中心所不曾留意的、複雜的交涉現象，包括文化接收方在接受過程中對輸出文化所進行的篩選、改進、重新編碼或重新創造。(王汎森，2014：647-648) 此外，需跳脫“國家”的局限，看到海域及區域邊緣之“邊境人”⁴的影響。葛兆光便說過中國的“周邊”是移動的，無“邊界”(boundary)，而有“邊域”(frontier)，故以今日國家領土概念上溯研究歷史將有所忽略。(葛兆光，2017：25) 此外，還需著眼於朝貢關係以外的經濟與商業往來、海域活動及文化交流。近來，張伯偉提出的“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吸收了過去對東亞世界討論的優劣，提出以下內涵：其一，將歷史上的漢字文獻當做一個整體，無論研究哪一類文獻也要注重與其他類別文獻的關係。其二，漢文化圈內部的文化轉移或觀念旅行主要依賴書籍的流傳和閱讀，故用“環流”的觀念看待書籍的閱讀或誤讀，探尋文化的借鑒和同化之處。其三，以人的內心體驗和精神世界為目標，打通中心與邊緣，將各地區的漢籍文獻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尋求期間的內在聯繫。其四，注重文化意義的闡釋，注重不同語境下相同文獻的不同意義，注重不同地域、不同階層、不同性別、不同時段上人們思想方式的統一性與多樣性。(張伯偉，2016：25)

本文的“尊周思明”與“北學中國”之議便放到東亞秩序更迭下的中、朝文化與思想交流脈絡，探討朴趾源如何看待彼時的中國及他作為一名 18 世紀末朝鮮士人所關懷的問題。文獻以 1997 年出版，朱瑞平校點的《熱河日記》為根據，輔以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整理的線上數據版及影印手鈔本為參照。

⁴ “邊境人”概念來自村井章介，指倭寇與海盜等。(轉引自岸本緒美，2005：83)

第貳章、“尊周思明”的淵源

嗚呼！皇明，吾上國也。上國之於屬邦，其賜賚之物雖微如絲毫，若隕自天，榮動一域，慶流萬世；而其奉溫諭，雖數行之札，高若雲漢，驚若雷霆，感若時雨。何也？上國也。何為上國？曰中華也，吾先王列朝之所受命也……今清按明之舊，臣一四海，所以加惠我國者亦疊葉矣。金非土產則蠲之，彩馬衰小則免之，米苧紙席之弊，世減其數……然而我以惠而不以恩、以憂而不以榮者，何也？非上國也……何也？非中華也。（朴趾源，1997：187）

1392年，朝鮮開國君主李成桂（1335-1408）自立為王，請國號於朱元璋以得明朝認可。這之後朝鮮與明朝保持宗藩關係直至明亡。滿人入住中原後，沿襲了明朝的對外策略，與朝鮮依舊以宗藩關係往來。然朝鮮對待明清兩朝的態度卻截然不同，上引《熱河日記·行在雜錄》便是一例：明朝即便賞賜微毫、溫諭數行，也是上國隆恩；反之，清朝即便減少朝貢方物，多有體恤，也只是施“惠”，算不上“恩”。清朝定鼎中原後，對朝鮮施德化政策。這些政策包括釋放朝鮮人質、減免歲貢、將每年四次的朝貢合為一次、優待朝鮮使臣、以三品清朝官員出使朝鮮，並嚴格管控他們的紀律。相對的明朝出使朝鮮的不是宦官便是僅有六、七品的給事中、行人，最高便是五品翰林了。（孫衛國，2007：380-398）如此截然不同的態度，典型地反映了明清鼎革後朝鮮對明朝念

念不忘的情感與仰慕。學界將這種現象稱作“尊周思明”，其出現與朝鮮的文化傳統及東亞秩序的更迭有關。本章第一節交代朝鮮“尊周思明”情懷的文化淵源與理論基礎，以瞭解朴趾源《熱河日記》裡“尊明”的文化脈絡；第二節則從“尊周思明”的歷史淵源切入，解釋明清鼎革、華夷變態後，朝鮮如何在“尊周思明”的旗幟下，對“中國”的論述分裂成“文化中國”與“現實中國”，並對比朴趾源的“上國”與“大國”。

一、慕華心態與朱子正統觀

“尊周”概念源自春秋周室衰微，諸侯尊周室、攘夷狄的事跡，故本來便包含“攘夷”的元素。因此，朝鮮的文化語境裡“尊周”又常與“攘夷”並稱作“尊周攘夷”。有別於中國文化較熟悉的“尊王攘夷”，“尊周攘夷”強調“周”含有華夷之辨及正統意識；“尊王攘夷”強調“王”更多地指代中央政權。（孫衛國，2007：78）據孫衛國，朝鮮所謂的“尊周”即“思明”，“攘夷”則是攘斥清朝，二者乃一體兩面的關係。（孫衛國，2007：77）朝鮮“尊周思明”的淵源和理論原則乃慕華心態與朱子對正統論的詮釋。

《熱河日記·忘羊錄》載朴趾源與中國學者尹嘉銓筆談，尹嘉銓提及《東坡志林》⁵中的“高麗公案”。朴趾源回答道：“東方慕華，即其天性也”，且

⁵ 《東坡志林》載高麗公案原文：“元祐五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為樞密院禮房檢詳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誠一使契丹，於虜帳中見高麗人，私語本國主向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先帝始有招徠之意。樞密使呂公弼因而迎合，親書劄子乞招致，遂命發運使崔極遣商人招之。’天下知非極，而不知罪公弼。如誠一，蓋不足道也。”（紀昀，2003a：863-45）

屢屢強調東方“慕華之誠”。（朴趾源，1997：213）該說在朴趾源所處的乾隆時代或許只是中、朝文人筆談中的客套話，然若置之於明清鼎革前，朴趾源所述到底不假。朝鮮太祖李成桂篡奪高麗王位後，擬定了“朝鮮”和“和寧”兩個國號奏請朱元璋裁定。朱元璋旨曰“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可以本其名而祖之。體天牧民，永昌後嗣”（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2006：卷三）。所謂“其來遠”，指中國古籍所載箕子與朝鮮的關係。《尚書·微子》載“箕子者，紂亲戚”，因見紂王淫泆，進言不果，遂被髮詳狂而奴。（司馬遷，2013：1609）《尚書大傳·殷傳》又記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後：“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紀昀，2003b：68-401）《漢書·地理志下》也記載了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儀、田蠶織作”。（班固，1962：1658）。孔子還謂“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何晏集解、邢昺疏，1999：246）李氏朝鮮極崇拜箕子，不僅設立箕子廟、考究其生平，官方編撰正史《東國通鑒》或野史《三國遺事》都將朝鮮史的開端溯源至朝鮮箕子，視其為“小中華”之始。由於箕子與中國文化有承接關係，故請國號於明，又將國號比附“箕子”，皆是慕華心態的表現。通過對箕子的認同，朝鮮不僅在歷史上尋得立國的合法性，亦將朝鮮的淵源提升到與中華文明平等的位置。（孫衛國，2007：36-38）除了國號，朝鮮的禮樂、衣冠、紀年、官制悉遵明制，以漢文為朝廷官方文字，並以習中國聖賢典籍為傲。朝鮮慕華的動機志在“以夷易華”。（孫衛國，2007：44）朝鮮最初的定位乃“東夷”，通過學習明朝的漢文化以“華化”。在儒家文化圈子裡，這無疑是通過習得中國文化以抬高己身的文化地位，故朝鮮又自稱“小中華”。慕華的另一具體表現則是朝鮮對明朝的事大舉動。終明一代，朝鮮每年都要派遣使臣

向明朝朝貢。除了歲貢，皇帝聖節、皇太子千秋節亦要遣使奉表朝賀、貢方物，其餘慶慰謝恩無常期。此外，朝鮮凡冊封國王、世子、王妃都要請示明朝以得到宗主國的認可。甚至朝鮮國王崩，明朝也要賜謚號於朝鮮國王才算圓滿，否則死後不能稱作王，亦無廟號。上述諸例足見朝鮮對明朝的事大之誠。

高麗王朝末，安珣（1243-1306）自元朝引入程朱理學思想。程朱理學鼎盛於李朝前半期，代表有李滉（1501-1570）與趙光祖（1482-1519）等。李成桂立國初時為了維護和加強自己的統治地位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奉程朱理學為官方學，視其為經邦治國的唯一真理。（戴瑞坤，2000：14）朝鮮一朝，程朱理學對朝鮮士人的影響非常大，乃士林的思想原則，並形成了獨具朝鮮特色的性理學。而朱熹對正統論的詮釋及其所弘揚的《春秋公羊傳》“大一統”思想，正是“尊周攘夷”的思想資源。朱熹的正統論有兩個表現：一是現實中尊中華、攘夷狄、復仇雪恥，標榜華夷之別並主張抗金圖強；二是法《春秋》立綱常的史學觀念。（孫衛國，2007：25）《資治通鑑綱目》中朱熹為中國各王朝辨其正統，從他視為正統的王朝來看有兩個特點：其一是漢族所建立的王朝，其二是大一統的政權。清人入主中原後，其以“夷”的身份所建立的政權於朝鮮所接受的朱熹正統觀而言是非正統的。正是在這種情況的激蕩下，朝鮮儒士開始注重正統論，並以之為“尊周思明”的理論武器。（孫衛國，2007：24）

二、從“文化上國”到“實力大國”

1592年，豐臣秀吉（1536-1598）入侵朝鮮，一個月內攻陷京城，並趕走朝鮮國王李昞。朝鮮向宗主國求助，明朝遂發動四萬兵出戰朝鮮，豐臣秀吉兵敗平壤，雙方於1595年議和。豈料1597年豐臣秀吉再侵略朝鮮，朝鮮二次向明朝求援，明朝再派兵幫忙，此役於1598年隨豐臣秀吉的逝世而告終。朝鮮將此役稱為“壬辰倭亂”⁶，後世的朝鮮儒士總為萬曆皇帝派兵援助朝鮮一舉感戴不忘，認為若無明朝的援助，朝鮮早變成倭寇之地。此般感恩之心亦是朝鮮慕華心態之歷史根源。

明清鼎革之後，被視為“夷人”與“胡虜”的女真入主中國。中國由一文化上國淪為胡虜的腥膻之鄉，這在奉行儒家文化的東亞圈造成極大的衝擊，尤其朝鮮。對朝鮮而言，這無疑顛覆了他們的世界觀及其所奉行的朱子正統觀，蓋是次並非簡單的政權更替，其背後象征的乃“華夷變態”與“失序”。由於朱子學對正統觀的詮釋及朝鮮人一貫的慕華心態，即使朝鮮迫於國力懸殊而無奈向清朝俯首稱臣，表面維持宗藩關係，然其心態上始終鄙夷由夷人所主的清朝。吳政緯將“思明”解釋作明清鼎革後，朝鮮因信仰明朝所象徵的中國文化，憂慮清政權的興起導致明朝文化消亡而產生的焦慮。（吳政緯，2015：49）面對此般焦慮，朝鮮通過頻頻追憶有關皇明的記憶與萬曆皇帝壬辰倭亂之恩，以抵抗中華文明的消亡，並以存中華文明於鴨水之東為己任。可見，“思明”並不單單表示追念明朝而已，它包括華夷觀的辯證關係、感戴皇明之恩的感恩之心及保存中華文化的責任感。無怪乎朴趾源於《熱河日記》卷首即言：

⁶ 涉及此役的國家對它有不同稱呼，若中國多稱“萬曆朝鮮之役”，日本則稱議和前的第一階段為“文祿之役”，1597-1598年的第二階段為“慶長之役”。本文以朝鮮語境為主。

清人入中國，而先王之制度變而為胡。環東土數千里畫江而為國，獨守先王之制度，是明明室猶存于鴨水以東也。雖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肅清中原，以光復先王之舊，然皆能尊崇禎以存中國也。（朴趾源著，朱瑞平校點，1997：1）

國內，朝鮮不僅設壇與廟崇祀明朝皇帝與明朝東征將士，朝鮮孝宗甚至曾有意北伐中國，光復中華；在中國，燕行使臣異常關注清朝的衣冠、風俗、文物，以之與明代的制度比較；或每每經過疆域、山川、名勝與遺跡，便要喚起對皇明的記憶，揭示他們對明代歷史的熟讀；又與中州士人筆談，便要詢問他們關於前朝之事，尤其喜歡觸及冠服之變的問題，企圖以此激蕩中州士人與他們同樣的思明情節。若無，他們便會感歎中華不再。通過與清帝國的對比，朝鮮使臣實現對過去之“華”的讚美與現實之“夷”的鄙夷，使“中國”變成了兩個分裂的“中國”。（葛兆光，2014：9）吳政緯亦將朝鮮使臣上述在中國境內的“思明”動作，解釋成“在沒有中國的地方尋找中國”（吳政緯，2017：136）所謂兩個“中國”，即朝鮮使臣中國論述中的“理想中國”與“現實中國”。“在沒有中國的地方尋找中國”，即在清朝入主後的地理中國與政權中國尋找僅存在於朝鮮人記憶中、抽象的、文化認同所在的明朝中國。尊周思明的過程中，清初朝鮮使臣對明朝的評價由於被美化且理想化而趨於單調，反而失去了明代朝天使對中國論述的多樣性。反之，對清朝的評價則因鄙夷之心而顯得非常差勁。若《熱河日記》所記盧君以漸對清朝中國的態度便“在道逢人，無論滿漢，一例稱胡；所過山川樓臺，以其為腥膻之鄉而不視也。”（朴趾源，1997：327）所謂“現實中國”，不過是相對於抽象的“理想中國”而言的，並不等於當時的中國實況。由於朝鮮使臣的偏見與鄙夷，“現實中國”的記錄亦

存在“誤讀”的現象，例如將傳聞中江南女子的題詩解讀作明清鼎革之際漢人為虜所掠而家破人亡的悲情故事⁷。

朴趾源心中顯然也有兩個中國。〈行在雜錄篇除了強調皇明有恩，清朝施惠之別，還強調了“上國”與“大國”之別。篇首即云“皇明吾上國也”，清朝則非上國，其關鍵在清朝非中華也。朴趾源進一步論述“我力屈而服，彼則大國也。大國能以力而屈之，非吾所初受命之天子也。”（朴趾源，1997：187）意即清朝以武力屈人，算不上是“文化上國”，只能以“大國”稱之罷。對照《熱河日記》中“上國”與“大國”的使用，便能發現朴趾源對這二字的區別處理得很謹慎。除了〈行在雜錄〉篇外，《熱河日記》僅載與中州文人筆談的對話裡才稱清朝為“上國”，其餘第一人稱視角下的敘述或議論多用“大國”指稱清中國。據〈審勢篇〉言，朝鮮使臣訪中國有五妄，這五妄多指朝鮮使臣以存中華之制為由而自感優越，交流時輕易表露出對中州士人的鄙夷。朴趾源認為此般態度既不明智又失禮，應“得其歡心，必曲贊大國之聲教，先安其心。”（朴趾源，1997：218）故與中原文人筆談時稱清朝為“上國”實為一種禮貌與策略性對話的考量。與一般朝鮮使臣對清中國鄙夷的論述有別，朴趾源對“大國”的論述較多樣，或說，“大國”之稱本身即是一種肯定。除了代指地理中國或字面之意思外，“大國”亦包括正面的評價。若他提及清政府編木為梁以禦潦淖，謂之“大國心法”（朴趾源，1997：54）；又他提及往熱河的路上，提督為外國一賤隸費心周全、奉職誠勤，有“大國之風”（朴趾源，1997：123-124）。又〈駟汛隨筆〉中所列東人自燕還者所見第一壯觀物列有疆

⁷ 該詩題：“椎髻空憐昔日妝，紅裙換著越羅裳。爹娘生死知何處，痛殺春風上沈陽。”該詩題於戊午年正月二十一日，時系康熙十七年（1678年），是三藩之亂的第五年。詩中女子乃吳三桂一部的家屬，被沈陽王章京所掠，故非明清鼎革使人。（葛兆光，2014：113-115）

域、建築、市鋪、關隘與舟車。綜上所述，朴趾源的“大國”之“大”，除了涵蓋疆域之大、戰鬥力之大外，還有文物制度之大，是相對朝鮮之大。可見朴趾源雖對“大國”表示肯定，然其肯定的出發點與“上國”是不同的。朴趾源顯然在文化認同皇明中國的同時，客觀地意識到了清中國在實力上遠遠超於朝鮮。自明亡至正祖朝（1776-1800）已百餘年，“文化上國”已不復存在，而朝鮮所信仰的“自古胡虜必無百年之運”已落空，反之，清朝“實力大國”的事實大喇喇擺在眼前，與朝鮮熟悉的“現實中國”論述有所落差。然而，尊周思明的情結是如此深遠地影響朝鮮士人，以致影響他們如何看待“現實中國”。欲使朝鮮士人正視清中國的實力，朴趾源不得不建立理論，重整朝鮮對中國的論述，以整頓一套對待中國的新模式。

第叁章、“北學中國”的內涵及其與“尊周思明”的關係

16 世紀末至 17 世紀初，朝鮮經歷了由日本發動的壬辰倭亂和女真發動的丙子胡亂（1636-1637），又朝廷內部各勢力間的政治鬥爭、土地兼併、兩班制與農民的社會衝突兼外來文化衝擊，朝鮮可謂內憂外患。加上清朝對待朝鮮的政策漸趨德化，以及燕行使目睹現實中國與論述中“現實中國”的落差後，朝鮮實學遂在這樣的背景下興起。（楊雨蕾，2011：219-131）它講究“實事求是”、“利用厚生”與“興利除弊”，以尋得方案解決朝鮮的問題。（李英順，2005：47-51）實學中有一派叫北學派，提倡學習清中國造船、通路、橋建、修車等技術。（趙華偉，2014：20）其代表多是燕行中國的朝鮮使臣，若洪大容（1731-1783）、朴齊家（1750-1815）、柳得恭（1748-1807）。“北學”一詞最早見於《孟子·滕文公章句》：“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導，北學於中國。”（趙岐註、孫奭疏，1999：147）此處，“北學”乃從地理位置而言。對朝鮮而言，這則是從清朝的地理位置出發，蓋清朝興起於朝鮮北部；另一方面亦有借儒家經典支持自己論點的意味。（楊雨蕾，2011：231）北學派的倡議者通過燕行接觸現實中國遠比所知的強大，提倡北學中國，因而重新審視與處理了朝鮮與中國的關係，產生了新的華夷觀。洪大容乃北學派先驅，於 1765 年

隨叔父洪億的使節團拜訪北京。期間，他結識了古杭三才並積極與清代儒生交流切磋，結下誠摯的友情。洪大容於 1766 年回國後，將其旅華期間與清朝儒士的交流整理作《乾淨術會友錄》⁸，該作在朝鮮士人間流傳極廣，回應也很二極。支持者以中朝文人的真摯之交為佳話，反對者則認為洪大容以“荊頭舉子”為“天涯知己”，乃“可恥行徑”（夫馬進，2010：161），何況這些中國儒生不思明朝且“赴虜舉”，尤其可恥（吳政緯，2015：117）。洪大容曾於《湛軒書·醫山問答》中謂：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凡有血氣，均是人也。出類拔華，制治一方，均是君王也；重門深濠，謹守封疆，均是邦國也；章甫委貌，文身雕題，均是習俗也；自天視之，豈有內外之分哉。是以各親其人，各尊其君，各守其國，各安其俗，華夷一也。（韓國學綜合 DB，-：內集卷四）

又《又答直齋書》曰：“今時之夷狄也，以其久居中國，務其遠圖，稍尚禮義，畧倣忠孝，殺伐之性，禽獸之行，不若其初起之甚。則謂之諸夏之不如夷狄，亦何不可哉？”（韓國學綜合 DB，-：內集卷三）這種“華夷一也”、文化使然的新華夷觀及與清人為伍的行徑，顯然不符合朝鮮固有的“尊周思明”情結與華夷觀。洪大容的好友金鍾厚更在尊周大義上與他做了辯論。《乾淨術會友

⁸ 如今流傳的版本乃洪大容五世孫洪榮善 1939 年所整理的《湛軒書》中所收錄的《乾淨術筆談》。《乾淨術會友錄》今已不得見，據知其於 1772 年以前曾易名作《乾淨筆譚》。（夫馬進著、陳瑋芬譯，2011：117-118）可以知道的是，不同版本之間有所出入，尤其《乾淨術筆談》為細心改動後的版本。（吳政緯，2015:92）

錄》引起的爭議，正是新舊華夷觀的撞擊現象，背後牽扯的是“尊周思明”的文化認同。作為洪大容的學生與北學派的代表，朴趾源必也瞭解上述情況。欲說服朝鮮北學中國，朴趾源不得不解決上述辯論中未解決的難題，即“尊周思明”與“北學中國”的衝突。本章透過《熱河日記》中“尊周思明”與“北學中國”的議論以及北學中國的對象，看朴趾源如何論證“北學中國”的合理性與可行性及如何化解“尊周思明”與“北學中國”的衝突。

一、朴趾源“北學中國”的理論根據

〈駟汛隨筆〉中有如此一段有趣的記載，即朝鮮人每逢自燕京而還者，必問中國第一壯觀之物為何？該文模擬的答案列出了中國的地理山川、城池宮闕、樓臺市鋪……此時卻出現一個轉折，即上士謂中國“都無可觀”。何以無可觀？蓋從皇帝到庶人皆薙髮。哪怕功德侔殷、周，富強邁秦、漢，學問有陸隴其、李光地者，文章有魏禧、王士禎者，有博學如顧炎武、朱彝尊者，一薙髮，便淪為胡虜，胡虜則和犬羊無異，故無足可觀。（朴趾源，1997：60）朴趾源先肯定發此論者必曉春秋大義，後卻謂：

中華之城郭、宮室、人民固自在也，正德、利用、厚生之具固然也，崔、盧、王、謝之氏族固不廢也，周、張、程、朱之學問未泯也，三代以降聖帝明王、漢唐宋明之良法美制固不變也。（朴趾源，1997：61）

此即朴趾源“北學中國”的合理性——將欲從中國學習的對象比附為先王先聖的遺法。中國雖已為胡虜所據，然邏輯上前朝留下的良法美制並未消失。他還進一步說胡虜恰恰因為知曉中國有可利之良法供久享，才奪而據之。（朴趾源，1997：61）他又以“斷瓦”、“碎礫”及“糞溷”為例，說明這些東西雖是棄物與污穢之物，然集斷瓦可拼湊出各種形狀，可供裝飾民舍繚垣；又民家因貧不能在鋪磚於門庭者，聚諸色琉璃碎瓦及水邊小礫之磨圓者，可禦泥淖；糞溷用以糞田也則惜之如金。（朴趾源，1997：61）將中國先朝遺法比作斷瓦、碎礫與糞溷，顯然是站在朝鮮的認知角度而言的。原來的文化中國為女真所據，與地理中國不再重疊，故清朝中國的一切看起來便已“污穢不堪”、“殘缺不全”。然朴趾源更欲強調的是，只要發揮“利用”的精神去看待這些斷瓦碎礫，還是可以達到“厚生”的效果的。“利用厚生”一詞最早見於《尚書·大禹謨》：“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孔安國傳、孔穎達疏，1999：88）蔡沈對該句的釋義為“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饑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紀昀，2003c：58-15）據朴趾源的邏輯，“利用”和“厚生”乃條件關係：“利用然後可以厚生，厚生然後正其德矣。不能利其用而能厚其生，鮮矣。”（朴趾源，1997：12）此處，“利用”指運用各種工具提高生產力；“厚生”指的是使百姓生活富裕。“利用厚生”即通過科技發展改善生活水平，最終達至“正德”的目的。（趙華偉，2014：20）以“利用厚生”的態度去學習中國先朝遺法即“北學中國”的可行性。他進一步論述“為天下者，苟利於民而厚於國，雖其法之或出於夷狄，固將取而則之，

而況三代以降聖帝明王、漢唐宋明固有之故常哉！”（朴趾源，1997：61）此處可見朴趾源作為一名北學派實學家實事求是的實際性考量：既然可利用而後生者，哪怕來自夷狄，也該取法之。當然他再次強調，其欲學習的對象乃前面提過的先王之法，再次提醒讀者它的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提倡學習中國之餘，朴趾源未曾表示不欲“尊周思明”。從《熱河日記》所用之崇禎紀年及其“不忍忘中國”、“存崇禎中國鴨綠以東”即知，朴趾源依舊實踐“尊明”文化。又他每次提及前朝，必以“皇明”稱之，以“大國”而非“上國”區別清朝中國，這些都是典型的“尊周思明”表現。他只是不齒朝鮮人因“尊周思明”而妄顧中國實力上較朝鮮更強大的事實而忽略可利用而厚生之處的極端表現。〈太學留館錄〉載尹嘉銓與朴趾源及一眾人談罷，尹氏起抽紅刺三片及所製《九如頌》予朴趾源，望其傳謁正使，遂尾隨朴趾源至正使處。朴沒料及如此，心裡自話“我東大夫生貴甚矣，見大國人，無滿、漢一例以胡虜視之，驕倨自重，本自鄉俗然也，當不察彼是何許胡人、何等官階，而必無款接之理，雖相接必以犬羊待之”（朴趾源，1997：127）看似陳述，實則諷刺。又〈審勢篇〉中謂朝鮮遊中國者五妄，即包括“以外藩土姓，反陵中州之舊族”；“其禮俗文物，四夷莫當，顧無寸長可與頡伉中土，而獨以一撮之髻自賢於天下”；“奉使者恥其公庭拜揖，輒圖寬免，遂成規例。時有接遇，率以亢簡為政、恭謙為辱，彼雖不與苛責，安知不侮我之無禮乎？”；“自知文字以來，莫不借讀於中州……忽謂中土不見文章”；“一遇中州之士，見其誇張休澤，則輒謂一部《春秋》無地可讀，每嘆燕趙之市未見悲歌之士。”（朴趾源，1997：217）顯然這五妄都是針對朝鮮人“尊周思明”的極端表現而言的。該篇還引陳慶之自魏南還，甚重北人，朱異怪而問之一事。

慶之的理由是：“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為荒中，此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禮儀豐盛，人物殷阜。耳目所識，口不能傳。”朴趾源遂感歎“望洋發嘆，今古同情”。（朴趾源，1997：218）所謂“今古同情”，即朴趾源旅華所見之“大”，和朝鮮對“現實中國”的論述中相差遠矣，不得不使他震撼。然回過頭來面對朝鮮人所犯之五妄，朴趾源的中國見聞，難道不也如陳慶之般“口不能傳，望洋發嘆”嗎？這一切都在強調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即中國的文物制度、經濟發展、城郭的建設皆比朝鮮進步。為了解決朝鮮人因尊周思明而妄顧清中國之實力的問題，朴趾源建議了一套與中州士人交談的新模式，包括“寄意禮樂”，“自附典雅”、“揚挖歷代，毋（毋）逼近境”、“遜志願學，導之縱談”、“勸示中外之一體，務遠其嫌”。（朴趾源，1997：218）畢竟朝鮮人若繼續抱著五妄對待中國人，他們便無法從心態接受在中國尋找利用厚生之道。

從朴趾源所建議之對待中州士人的模式看來，更多的是出於策略性的考量與實際的需求，並未見崇拜與仰慕之情。回到〈駙汎隨筆〉再看，朴趾源謂：“聖人之作《春秋》，固為尊華而攘夷，然未聞憤夷狄之猾夏”，意在強調“攘夷”，即“尊周思明”與學習中國並無衝突，甚至進一步言與欲攘夷者，還不如“學中華之遺法，先變我俗之椎魯，自耕蠶陶冶以至通工惠商，莫不學焉。人十已百，先利吾民，使吾民制梃而足以撻彼之堅甲利兵，然後謂中國無可觀可也”，此言甚至有些“學夷而攘夷”⁹的意味了：原來“北學中國”無害

⁹ 有人將實學家類似的言論與中國十九世紀中葉魏源所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相提並論。楊雨蕾卻指出，實學家所謂“師夷攘夷”，所指之“夷”乃與“理想中國”分裂後的清代中國。因為發現清代中國依舊有“中華之可利”，才提倡學習之，反映的依舊是儒家文化圈的認同。中國十九世紀所面對的西方世界卻已是儒家文化圈外的另一個宇宙觀了。

於“尊明”，甚至可以作為實現“攘夷復明”的一種手段。（朴趾源，1997：61）

朴趾源上述所作所為實是一種對朝鮮與中國、“尊周思明”與“北學中國”關係的重新思考與重新處理，尤其調整了固有的“尊周思明”實踐內容裡有礙於“北學中國”之處，並相應推出一套與中州士人相處的新指南。他強調“北學中國”並不侵害“尊周思明”，甚至可以“師夷攘夷”的方式實現復明大業，志在把“北學中國”的合理性建立在已有的認同（“尊周思明”）上，使其被接受的可能性增高。這樣的調和，是固有的尊明模式與“北學中國”的理論產生摩擦後而出現的解決方案。下一章將進一步通過朴趾源“北學中國”的學習內容與對象，論證何以朴趾源的“北學中國”並不妨礙“尊周思明”。

二、利用厚生之對象

朴趾源所謂“北學中國”，確切而言即尋找中國可利用厚生之對象。《熱河日記》序末曾言及利用厚生的對象：“城郭宮室、耕牧陶冶，一切利用厚生之道皆在其中”。（朴趾源，1997：序 2）以下將從《熱河日記》整理出朴趾源所記從中國可學對象，礙於篇幅，本節不能盡列，只能篩選其中顯要者而錄。

（一）車馬

〈駟汛隨筆〉中記載了中國車制的操作方式和用途，包括太平車、大車與獨輪車。朴趾源留意到中國用車普遍，且都同軌。他比較朝鮮的

情況，謂“未嘗無車，而輪未正圓，轍不入軌，是猶無車也。”（朴趾源，1997：64）他意識到車作為交通的運輸功能，謂“所以中國之貨財殷富，不滯一方，流行貿遷，皆用車之利也。”（朴趾源，1997：65）

他留意放牧的牛、羊、馬，再回望館外所繫之朝鮮鬣，竟謂寒心。他謂朝鮮國俗之所以貧者，蓋由畜牧不得其道。以馬為例，他說朝鮮馬匹都是元世祖所放之種，四五百年來不曾換，故東人所謂馬種不如人只是藉口。他隨後詳述中國養馬之法，並一一比之朝鮮，句句不忘感歎“寒心”，最後更不忘諷刺，若真以馬種不良為由，不如求牝牡數十匹於大國以易其種，中國若嫌疑朝鮮求馬私養的舉動，那就以歲價潛購，然何以朝鮮人無動於衷？“非不能，乃不肯學也。”（朴信趾源，1997：145）

（二）水利

朴趾源自北鎮廟還新廣寧途中，逢城外一民居失火方熄。他看見路中有三座水車正要收去，特地令人小停而仔細記錄了水車的形制。（朴趾源，1997：65）當時朝鮮北部多山，乾旱之時雖咫尺有水源，卻因地勢過高無法取水灌溉。他以該水車的結構作為啟發，回國後向國王提出以水車灌溉農田，解決了農田因地勢過高無法灌溉的問題。（趙元興，2008：341）

他亦觀察了中國的水井構造有磨石為蓋，既防人墮溺，又障塵土；“井蓋上設轆轤，下垂雙綆，結柳為椽，其形如瓢而深，一上一下，終日汲不勞人力”；“水桶皆鐵箍，以細釘緊約，絕勝於縮竹。為經歲久

則朽斷，且桶身乾曝，則竹箍自然寬脫”。（朴趾源，1997：13）又他還觀察到中國人汲水皆肩擔而不背負，朝鮮人背負之法則妨於窄路隘巷，應效中國之法。

（三）生產工具

中國民居多用磚製，而朝鮮則多用石頭。磚頭只要做好模子，便能輕鬆地複製，無需耗力琢磨。又磚塊重量輕，易搬動。劃一的外形尺寸又使建築工作事半功倍。相比之下，朝鮮石制從闢之於山，到運輸、琢治、建築每一個階段都要耗費更多的人力。此外，朴趾源還提倡學習中國的轉磨與窯制。朴趾源記載的中國轉磨耗力少，輸出大，相較朝鮮的則“我東婦女一筵數斗之輪，則一朝鬢眉皓白，手腕麻軟。”（朴趾源，1997：66）朴趾源看過中國的磚窯後，直謂朝鮮的非窯，而是臥竈。朝鮮的窯非磚制，而是支木而泥築薪，以大松作燃料。這一來則耗費松木，二來其制使其火不能往上燒，必又耗費更多松木。效法中國窯制則能解決上述問題。

（四）房屋

〈渡江錄〉記朴趾源隨行到柵外，見柵內“閭閻皆高起五梁，苫草覆蓋，而屋脊穹崇，門戶整齊，街衢平直，兩沿若引繩然，牆垣皆磚築”，不由感歎“絕無村野氣”、“大規模細心法”、“柵門，天下之東盡頭，而猶尚如此”。（朴趾源，1997：10）第二日的日記裡，他詳載了中國的室屋之制，包括地基、用材、室內結構、形狀大小、築

法……並比較了朝鮮用材及筑法上的缺陷，認為尤其可效其蓋瓦法。

（朴趾源，1997：16）

綜觀朴趾源所記“利用厚生”之對象，皆是文物制度與生產器具，其出發點則是以實用與效率來考量的，目的則是借鑒中國的良法改善朝鮮社會的生產方式，使其富強。朴趾源回國就職安義縣監後，確實將他在北京所學傳授給工匠，亦將自己所學的製磚技術運用於建築中。如此一來，所謂“北學中國”則不必然與“尊周思明”有所衝突。“尊周思明”背後反映的是一套朝鮮士人的文化價值認同，屬於“精神”層次；效法中國的城郭宮室、耕牧陶冶則是“器”的層次，在理論上並未涉及文化認同的轉變。這情況就好比朴趾源學習西方科學，卻認為天主教是無妄之說一樣。此外，《熱河日記》對朱子學以外的黃教、佛陀、關公崇拜文化都給予否定。衣冠之制，依舊認為朝鮮所穿的明代衣冠“袖袂廣濶，翩翩欲舞”、“燁如仙人”，對清代僅存前朝衣冠於戲臺之上，不由感歎“若中國生出真主，如皇明太祖掃廓乾坤，而愚民之習熟成俗者已百餘年之久，則亦或有以束髮加帽反為煩癢而不便者。”（朴趾源，1997：351）此言不僅仍以明朝衣冠為美，針對清朝統治中國，朴趾源顯然還是認為其乃顛倒乾坤。或許，通過朴趾源所建議的新模式與中州士人交流，過程中或將衝擊朝鮮舊有觀念，逐漸接觸新的價值。但這過程肯定是漫長的，至少以朴趾源當時建設的理論視之，“尊周思明”和“北學中國”並不必然相左。何況，朝鮮有多少人能踏上中土之旅？

第肆章、“他者中國”：朝鮮意識的體現

明清兩代，朝鮮朝天、燕行使持續地書寫中國，在論述中建構“中國”。這些論述中，由於撰寫者與撰寫對象的文化差異、撰寫者的自身差異以及兩個文化動態上的關係變化，導致所描述或呈現的異國形象與真實情況存在落差，這便是比較文學形象學所謂的“誤讀”現象。（楊乃喬，2013：262-265）然而這裡並非簡單的孰真孰假的問題，而是從“事實”（Fact）到“真實”（Reality）的過程中，撰寫者所屬的文化以及自身的立場與所知如何決定了他怎麼樣“選擇”與“呈現”事實。當中，一些元素或許被放大了，一些或許被忽略了，故最後呈現出來的異國形象乃一種“選擇的真實”。通過觀察“他者”與書寫“他者”，“自我”的意識也在建構中。作為本文最後一章，本章將探討朴趾源《熱河日記》如何展現“大國”的形象，通過他選擇性的書寫，窺視一位18世紀末朝鮮北學派實學家的關懷與認同。

一、預設的朝鮮士人讀者

“燕行錄”今日給學術界的意義是一批龐大的史料供明清史、東亞關係史、東亞文化等之研究。然若置之朝鮮王朝之時，這批“燕行錄”便是供那些無法踏上中國的朝鮮人接觸中國、閱讀中國、想象中國的讀物了。朴趾源想必預設了自己的作品亦會被朝鮮人傳閱。目前學界普遍以《熱河日記·渡江錄》中的“崇禎百五十六年癸卯”（即 1783 年）推作《熱河日記》的完成時間，當時距離朴趾源燕行回國已有三年。從這可推斷，朴趾源至少用了三年去撰寫與修改這部作品。《熱河日記》以其對中國事無巨細的描述聞名，但這不表示裡頭的“事實”是未經過挑選供讀者閱讀的。如他經過曾經白骨如山的古戰場虎北口，渲染的不是悲涼的氣息，而是“今昇平百餘年，四境無金革戰鬪之聲，桑麻菀然，鷄狗四達。休養生息乃能如是，漢、唐以來所未嘗有也，未知何德而能致之。”（朴趾源，1997：153）又他記山海關“稅官及守備坐關內翼廊，點閱人馬，照準鳳城清單。大凡中國商旅亦皆簿錄姓名居住、物貨名數，詰奸防偽，極為嚴肅。”（朴趾源，1997：84）兩處充滿歷史意義的地景，尤其後者還是明亡論述裡的要角，雖然朴趾源也不忘感歎“中山設此關以備胡，而吳山桂開關迎入之不暇也”，然隨即轉折謂：“當天下無事之日，徒為商旅之讎征，則吾於關亦奚足云。”（朴趾源，1997：84）沒有濃重的思明情緒，反而發出時過境遷之嘆，明清鼎革之際的光景不在，轉而強調一個大國關卡過檢之嚴格。朴趾源還在〈渡江錄〉卷末設了一篇〈舊遼東記〉記述遼東歷史沿革以及熊廷弼鎮守遼東之事。他評議“當皇明末運，用捨顛倒，功罪不明，其視熊廷弼、袁崇煥至死，可謂其長城矣，惡可免後代之讎哉。”（朴趾源，1997：32）這裡竟沒有悲哀清朝陷害皇明，而是將判斷失誤的責任歸咎明朝。從以上種種可見，朴趾源欲展示讀者一個政治與經濟實力上的大國，企圖讓讀者正視清朝的

統治，以支持他“北學中國”的立場。從“編木為梁禦潦淖”、“車同軌”、“門戶整齊，街衢平直”；從山川、風俗、宗教、文物、制度……朴趾源殷殷地尋找可利用厚生的對象。這並不表示說《熱河日記》裡沒有“思明”的論述，只是“思明”已不是《熱河日記》的首要內容。顯然朴趾源更關心的是中國有什麼可供學習的對象可用於朝鮮。〈太學留館錄〉、〈鵠汀筆談〉、〈傾蓋錄〉、〈忘羊錄〉等記載朴趾源與中州士人筆談的篇章裡，雖偶爾涉及敏感課題如王民皞（鵠汀）指朴趾源的網巾謂何厄，朴趾源回指王的頭問“這個光光，且是何厄？”（朴趾源，1997：132），然彼此的交談內容涉及天文、樂理、兩國禮俗、宗教、歷史。題材豐富，不志在窺視中州士人反清復明之志，也無意挑起他們為胡所治的尷尬境遇。至少從《熱河日記》所呈現的中朝文人交流之態度與內容，與第二章中所提及的朴趾源提倡之交流新模式是一致的。

僅靠〈駟汛隨筆〉的理論說明“北學中國”的合理性及梳理“尊周思明”與“北學中國”的關係顯然未夠。《熱河日記》裡，朴趾源偶爾會藉機諷刺朝鮮人因尊周思明而否定清朝一切的態度，以論證這種尊明的實踐方式不合理處，希望藉此讓朝鮮人重新審視清朝的統治。〈玉匣夜話〉裡寫了一則許生的故事。許生是一名奇才，獲請於朝。許生提出兩個條件，朝廷代表都無法滿足。許生遂提最後一個他所謂最容易的條件，即選朝鮮有為子弟，薙髮胡服，使做學者到中國求仕；小人之輩則到中國江南一帶經商，目的在於學習中國，窺探中國境內的實況。就好比間諜一樣。這條件實是針對朝鮮攘夷復明與北伐的企圖而言的。朴趾源實乃藉許生之口發表他“北學中國”、“師夷後攘夷”，以復皇明的想法與策略。然而故事中朝廷代表謂“士大夫皆謹守禮法，誰肯薙髮胡服乎？”許生聞此回答竟大叱曰：

所謂士大夫，是何等也？產於彝（夷）貊之地，自謂曰士大夫，豈非呆乎？衣袴純素，是有喪之服；會撮知錐，是南蠻之椎結也。何謂禮法？樊於期欲報私仇，而不惜其頭；武陵王欲強其國，而不恥胡服。乃今欲為大明復仇，而猶惜其一髮；乃今將馳馬，擊劍刺槍，彀弓飛石，而不變其廣袖，自以為禮法乎？

（朴趾源，1997：313）

朴趾源以上的諷刺可謂辛辣至極！無怪乎《熱河日記》在朝鮮被禁出版。故事中的朝廷代表即朝鮮一般士人的立場。朴趾源諷刺他們既要尊周思明甚至攘夷復明，卻又妄顧自身與清朝中國實力的懸殊，尤其又不肯學習中國之“大”。這樣談“復明”，從一個講究實事求是的實學家角度而言，根本就是不切實際。

《熱河日記》呈現的“利用厚生”之“大國”的論述裡，始終擺脫不了與“尊周思明”的關係。“北學中國”的理論欲成立，則必須解決“尊周思明”固有的實踐模式及背後涉及的文化認同問題。故朴趾源在《熱河日記》或先肯定“尊周思明”的大前提再提出“北學中國”的理據，或諷刺固有尊明模式的不可理喻處，或辯證“北學中國”如何有助“攘夷復明”，反復又綜合地向讀者論述，以解決“尊周思明”與“北學中國”的衝突。下一節將敘述纏繞著《熱河日記》的“尊周思明”與“北學中國”之議，實反映的乃朴趾源所處的朝鮮時代所面對的社會問題與認同的挑戰。

二、中國的論述，朝鮮的關懷

成長過程中，我們通過鏡中的映像、周遭的評價、與他人的比較等來認識自己。意即，“他者”（The Others）在“自我”（Self）的建構中是不可或缺的。不通過“他者”，則無以區別“自我”；通過識別“他者”，“自我”完成建構。明清兩代“燕行錄”對“中國”的持續性書寫，從慕華，到“理想中國”與“現實中國”的分裂，抑或“尊周思明”與“北學中國”的抉擇，個別“中國”之間的差異，與其說書寫的是中國的歷史更迭，還不如說是“中國形象”在朝鮮的更迭，再確切些毋寧是朝鮮各代的價值取向與認同的變化階尺。此處的價值取向與認同即朝鮮對明中華的文化認同。吳政緯指出，朝鮮的思明文化乃以犬牙交錯的狀態前行的。意即，從“思明”到“不思明”之間並非板塊式的割裂，而是以此消彼長的關係逐漸往前推進。（吳政緯，2015：201）《熱河日記》裡的“尊周思明”與“北學中國”之議，正是朝鮮某個階段“思明”內涵的更動，背後牽扯的是朝鮮的社會境況與自我文化認同的挑戰。

“尊周思明”固然是明清鼎革後，朝鮮因奉行儒家文化正統觀激蕩而來的遺民情懷。他們所持的正統觀使他們相信胡人的政權不過百年，諷刺的是百年過去清朝未見倒臺之勢，且部分燕行使開始意識到清朝並沒有如“現實中國”論述裡的那樣差勁。“失序”的現象動搖了朝鮮士林傳統的華夷觀。“思明”還是“不思明”？抑或“如何思明”？背後叩問的正是現實秩序與文化秩序不符的情況下，如何面對自身的認同？如何重整秩序？由於自立國奠基下來的慕華心態及“小中華”的自我標榜，朝鮮歷來通過凝視中國來建構自身。故面對

“失序”與“重整”的語境裡，朝鮮的論述不可能脫離中國。藉著回眸中國，重整和中國的關係與論述，才得以建構新的秩序應付東亞世界的變化。作為一本中國紀行，《熱河日記》正具備話語條件去重省上述問題。朴趾源欲解決的還不止華夷觀的問題，從他聚焦的“大國”種種文物、制度、技術來看，反射的恰是朝鮮在這方面的不足，以及一位朝鮮知識人圖強的心態。這些問題的交鋒下，朴趾源“尊周思明”與“北學中國”之議便是相應的重整與回應。它維持“尊明”立場，卻適當地調整了固有“尊明”模式的內容，以適應“北學中國”這新論述。

吳政緯指北學派的 18 世紀新華夷觀有三個內涵，即維持思明的立場、正視清朝統治與重界華夷定位。（吳政緯，2015：133）綜觀《熱河日記》裡有關“華夷”的論述，“維持思明立場”與“正視清朝統治”已毋庸置疑了，然“重界華夷”的表現在《熱河日記》裡並沒有那麼明顯，或者說，沒有那麼一致。許生的故事裡，朴趾源固然諷刺朝鮮人以東夷的身份自謂士大夫，但他面對中州士人時卻自稱為“小中華”（朴趾源，1997：127）；雖然他未表示鄙夷滿人，但他遇到一個鄙陋無足語的老學究卻強調了他滿人的身份（朴趾源，1997：24）至少《熱河日記》裡，朴趾源並沒有若洪大容那般“華夷一也”的明確言論。唯一明確地論及華夷之別的地方乃他意識到韓語與漢文因語言系統的落差導致中朝文人在掌握漢文方面所形成的落差。他把這種落差稱作“華夷之別”。這裡雖然也有文化使然的意味，然除此之外《熱河日記》裡並沒有明確為孰華孰夷辯證。

以上，我們看見朴趾源作為一名 18 世紀末朝鮮人關懷的議題，及他如何去回應它們。這些議題又與當時朝鮮的境遇及東亞的秩序有關。朴趾源的“尊周

思明”與“北學中國”之議，固然有突破的一面，如他對兩者的調整及他對清中國的正視。然學者往往過於強調其新的一面而忽略了其更多的舊的及模糊的一面：朴趾源依舊維持“尊周思明”立場，其文化認同並未轉向清中國。甚至我們還能看見他於華夷之分上在新與舊之間的徘徊。或許是他有意識地避免洪大容因“華夷一也”遇到的類似爭議，又或他自己並無意識。無論如何，這位既在舊的藩籬中有所突破，卻又帶著舊烙印在新與舊之間徘徊的人，或更接近一名有血有肉的 18 世紀末朝鮮知識人的心境原貌。

第五章、結語

通過梳理朴趾源的“尊周思明”與“北學中國”的議論，本文發現如下：

朴趾源對“理想中國”與“現實中國”的論述，尤其後者已見異於清初燕行使。以“大國”稱呼清朝表示朴趾源始承認並重視清朝的統治事實。其“大”表現在疆域、文物、制度與使臣接待方面。所謂北學中國，所學乃文物、制度、生產器具與生產方式，屬“器”的層次，與“大國”的稱呼相契合，卻不涉及文化認同的轉變，它是以“利用厚生”的實際考量作為目的而學習的。以“大國”區別已故“上國”，表示朴趾源的認知中“大國”在文化上仍未及“上國”，故朴趾源的“北學中國”實是在維持“尊周思明”的立場上提出的。

將朴趾源“尊周思明”與“北學中國”之議放置到 18 世紀末的朝鮮情境與東亞文化圈的秩序更迭這一脈絡視之，其反映的問題意識乃彼時朝鮮面對文化秩序與現實秩序不符，以及朝鮮國內自身的政治與民生問題而產生的。意即，“尊周思明”與“北學中國”討論的對象雖是中國，反映的卻是屬於朝鮮的關懷。朴趾源通過旅華的機會所給予的話語權，企圖在《熱河日記》調整“尊周

思明”的固有內容以適應“北學中國”的新主張。後者的提出則反映一名朝鮮知識人圖強的心態，希望透過學習先進技術以提升國家的實力。

朴趾源的關懷離今雖已日遠矣，然渺小如個人，或大如國家之事，今日皆未曾擺脫關於“認同”的叩問，故朴趾源在其時代的回應仍有其啟發意義。

參考文獻

一、原始文獻

【東漢】趙岐註【宋】孫奭疏（1999）。《十三經註疏·孟子註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漢】班固（1962）。《漢書地理志下·卷二十八》。北京：中華書局。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1999）。《十三經註疏·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漢】司馬遷（2013）。《史記宋世家·卷三十八》。北京：中華書局。

【清】紀昀（2003a）。《影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雜說之屬·東坡志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紀昀（2003b）。《影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經部書類·尚書大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紀昀（2003c）。《影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經部書類·書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1999）。《十三經註疏·論語註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朴趾源著、朱瑞平校點（1997）。《熱河日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二、研究專書

【美】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編、杜繼東譯（2010）。《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日】夫馬進（ふますすむ）著、伍躍譯（2010）。《朝鮮燕行使和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英】大衛·康納丁（David Cannadine）編、梁永安譯（2008）。《今日，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 Now?*）。臺北：立緒文化。

葛兆光（2014）。《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北京：中華書局。

葛兆光（2017）。《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孫衛國（2007）。《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

徐東日（2010）。《朝鮮朝使臣眼中的中國形象——以〈燕行錄〉〈朝天錄〉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

王汎森（2014）。《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社。

吳政緯（2015）。《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臺北：秀威資訊科技。

楊乃喬編（2014）。《比較文學概論（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楊雨蕾（2011）。《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張伯偉（2016）。《“燕行錄”研究論集》。南京：鳳凰出版社。

三、學位論文

趙華偉（2014）。《燕岩朴趾源實學思想研究》（碩士論文）。取自
[http://gb.oversea.cnki.net.libezp.utar.edu.my/kcms/detail/detail.aspx?recid=&FileName=1014308177.nh&DbName=CMFD2015&DbCode=CMFD&uid=WEEvREcwSIJHSlDRa1FhcTdWajFtT3ZlZXpJVWNTN3Q2NmFyQlpkUHpiQ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wwHtwkF4VYPoHbKxJw!!](http://gb.oversea.cnki.net.libezp.utar.edu.my/kcms/detail/detail.aspx?recid=&FileName=1014308177.nh&DbName=CMFD2015&DbCode=CMFD&uid=WEEvREcwSIJHSlDRa1FhcTdWajFtT3ZlZXpJVWNTN3Q2NmFyQlpkUHpiQ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wwHtwkF4VYPoHbKxJw!!)

四、期刊論文

【日】岸本美緒（2005）。〈“後十六世紀問題”與清朝〉。《清史研究》，2，81-92。

Fairbank, J.K. & Teng, S.Y. (1941).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2), 135-246.

戴瑞坤（2000）。〈朱子學對中、日、韓的影響〉。《逢甲人文社會學報》，1，95-115。

李英順（2005）。〈試論朝鮮實學文化及其特點〉。《東疆學刊》，22（3），47-52。

裴英姬（2009）。〈《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臺大歷史學報》，43，219-255。

五、線上數據庫

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2006）。《朝鮮王朝實錄》。取自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mql/login.html>

韓國學綜合 DB（無日期）。《湛軒書》。取自

<http://db.mkstudy.com/mksdb/e/korean-literary-collection/book/8756/>

陸、演講稿

夫馬進（ふますすむ）著、陳瑋芬譯（2011）。〈朝鮮奇書—關於洪大容《乾淨會友錄》、《乾淨筆譚》之若干問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取自

<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public/publications/newsletter/89/117-126.pdf>

七、專題研討會文章

趙元興（2008年3月21日）。〈18世紀朝鮮學者朴趾源的“利用厚生”主張、新視野下的中外關係史〉。海南三亞。取自

[http://gb.oversea.cnki.net/libezp.utar.edu.my/kcms/detail/detail.aspx?recid=&FileName=LDZW200803001026&DbName=CPFD2011&DbCode=CPFD&uid=WEEvREcwSIJHSldRa1FhcTdWajFtT3ZibXpuS3dTMEl0MzdST1FaL1VIa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wwHtwkF4VYPoHbKxJw!!](http://gb.oversea.cnki.net/libezp.utar.edu.my/kcms/detail/detail.aspx?recid=&FileName=LDZW200803001026&DbName=CPFD2011&DbCode=CPFD&uid=WEEvREcwSIJHSldRa1FhcTdWajFtT3ZibXpuS3dTMEl0MzdST1FaL1VIa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wwHtwkF4VYPoHbKxJw!!)